

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

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

人民出版社

PDG

目 录

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

——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

..... (1)

“综合经济基础论”必须彻底批判

..... (10)

哲学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

——揭露叛徒杨献珍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问题上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24)

“合二而一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哲学

..... (39)

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

——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建国以来，我国哲学战线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原则性的大斗争，即：关于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斗争，关于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斗争，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斗争。这三次大斗争，都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由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幕后导演，由叛徒杨献珍一个一个挑起的。这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同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激烈搏斗，是国际、国内尖锐的阶级斗争在哲学战线上的反映。

—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指出：在全国胜利后，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提出要继续革命，强化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九五二年底，毛主席

进一步制定了在我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与此相反，刘少奇公然对抗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一头栽进资本家的怀抱，拚命宣扬“剥削有功论”，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全国解放后，他又打着“唯生产力论”的破旗，抛出了一个所谓“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明目张胆地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且亲自跑到他们所控制的马列学院兜售这套黑货。

正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激烈斗争的时刻，叛徒杨献珍按照刘少奇的旨意，精心炮制出一个所谓“综合经济基础论”，挑起了哲学战线上的第一次大斗争。

杨献珍宣称：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综合性的”，“既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也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二者“能够平衡地互相衔接地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一视同仁地为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也要为资产阶级服务”。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所谓“综合经济基础论”。

很显然，杨献珍的这套反动谬论，一笔抹杀了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对立和斗争，否认了上层建筑的阶级性，妄图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全面地搞阶级合作，阶级投降。这就是要改变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反对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我国永远保存和发展资本主义。

“综合经济基础论”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挖一挖他的老

根，无非就是几十年来国内外新老修正主义者奉为至宝的那个“唯生产力论”。按照“唯生产力论”，中国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就只能听任资本主义自由泛滥，不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能搞社会主义。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恰恰是这种“唯生产力论”的变种。

杨献珍的这套反动谬论一出笼，当即受到了无产阶级的迎头痛击。杨献珍不甘心失败，一九五五年，他又进一步炮制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更加系统地宣扬“综合经济基础论”。他为了取得主子的支持，将这篇黑文送给刘少奇审阅。刘少奇公然为杨献珍撑腰打气，说“你的意见是对的”，私人资本主义“是基础的一部分”。

伟大领袖毛主席严肃批判了刘少奇的“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反动纲领，指出了它的反动实质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胜利实现。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不仅在理论上遭到破产，而且也被革命的实践所彻底粉碎。

二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一九五八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一切旧的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日益土崩瓦解，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和革命首创精神，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新局面，建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人民公社。

革命和建设的迅猛发展，吓昏了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头脑。刘少奇、彭德怀一伙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疯狂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攻击革命的群众运动，诬蔑我们党“夸大了主观能动作用”，是“主观唯心主义”。这时，杨献珍这个小丑以为时机已到，按照刘少奇的旨意，抛出了一个“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在哲学战线上挑起了一场新的斗争。

杨献珍武断地宣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胡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同“辩证法的同一性”是“两种范畴的同一性”，不是一个意思；并且采用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恶劣手法，企图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同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对立起来，说什么对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唯物论是拿反映论来解决的，唯心论是拿同一性来解决的”。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对立统一规律是一个普遍规律。矛盾的同一性即对立面的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也毫无疑问地适用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杨献珍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否认了思维与存在这一对矛盾的对立面，在一定条件的互相依存、互相转化；这样，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就没有普遍意义了。

杨献珍竭力标榜自己是“唯物主义”，实际上他形而上学地割裂了思维与存在的联系，把思维与存在绝对对立起来，陷

入了二元论，并由二元论滚到了主观唯心论。事实正是如此。他反对革命理论的能动作用，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抓住革命群众运动的非本质的和支流的东西无限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抹杀革命群众运动的本质和主流，竟然把他反革命的主观感觉当作客观现实，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不是主观唯心主义又是什么？

杨献珍否认思维与存在有辩证同一性，归根到底，就是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反对用毛泽东思想能动地改造世界，就是要用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蒙蔽群众，要用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改造世界。杨献珍的这种反动理论，正是刘少奇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理论根据。杨献珍宣传这种反动理论由来已久，并且十分猖狂。他在一九五五年起，就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宣传这种反动理论。一九五七年公然提出要把反对他这个反动理论，作为划分右派分子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妄图把坚持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观点的人，打成“右派”。一九五八年，他炮制了《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的大毒草，诬蔑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科学论断是“主观唯心主义”，并且令其同伙写文章宣传他的反动理论。同年十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尖锐地指出了杨献珍这种谬论的反动实质。但是杨献珍竟狗胆包天，进行对抗。十一月，他在讲课时疯狂咒骂主张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随后，在叛徒彭真、安子文之流的支持下，他又纠集其一伙，紧密配合刘少奇的反革命复辟活动，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上，进行了多次反扑，疯狂地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但是，在无产阶级的有力反

击下，他们的阴谋一次又一次遭到了失败。

一九六三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名论文，精辟地阐明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伟大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彻底批判了刘少奇、杨献珍一伙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对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上的斗争作了最科学的总结。

三

刘少奇、杨献珍一伙尽管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但是他们还要进行垂死挣扎。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又指使杨献珍炮制出反动的“合二而一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挑起了一场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斗争。

一九六四年，国际国内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一伙，紧密配合帝、修、反的猖狂反华活动，迫不及待地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我国人民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指引下，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国内开展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国际上同苏修展开了公开论战。反动的“合二而一论”在这样一个时刻出笼，正是适应了帝、修、反及其走狗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的需要。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毛主席关于一分为二

的光辉思想，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最精辟、最简明、最深刻的概括，是唯物辩证法的伟大发展。

承认一分为二，就是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侵略和颠覆的威胁。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可是反动的“合二而一论”却鼓吹什么“任何事物都是‘合二而一’的”，对立面的同一就是“不可分离的联系”，就是“共同点”，“共同要求”。这种反动谬论，企图调和矛盾，取消斗争，否认转化，反对革命，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唯心论。它的要害，就是要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合在一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它就是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理论基础。

为了推销这种反动理论，杨献珍之流公开叫嚷什么“现在一分为二讲多了，‘合二而一’讲少了”，攻击一分为二是什么“打人的哲学”，鼓动他们的徒子徒孙“多写文章，宣传‘合二而一’”。这些反动家伙赤膊上阵，公开对抗毛主席提出的一分为二，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但是反动派的猖狂只能加速他们的灭亡。“合二而一论”一出笼，立即遭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和革命群众的毁灭性打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斗争，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合二而一”的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的实质，宣判了反动“合二而一论”的死刑。

四

哲学战线上的这三次大斗争说明了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哲学上的两军对垒，从来就是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的，不能把哲学斗争简单地看作是“学术之争”。刘少奇、杨献珍之流拚命攻击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散布反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挑起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就是妄图动摇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哲学基础，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也正是在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长期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路线斗争的最科学、最正确的总结。因此，我们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必须结合党的历史，联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才能领会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精髓，真正把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学到手。

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还告诉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人们维护和执行什么路线，是由一定的世界观决定的。刘少奇、杨献珍之流所以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从世界观的根源来说，是由他们的叛徒的世界观决定的，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形而上学决定的。我们要自觉地捍卫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必须联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克服自己头脑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认真改造世界观；学会识别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

克思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否则，就要成为糊涂人，盲目的人，甚至就要成为假马克思主义的俘虏，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殉葬品。

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以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光辉胜利而告终，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刘少奇、杨献珍之流所散布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论”、“合二而一论”等反动哲学的余毒还没有彻底肃清，我们要对他们的反动哲学谬论一个一个地批深、批透、批臭，让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永远照亮我们胜利前进的航程。

（载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综合经济基础论”必须彻底批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指使他在哲学界的代理人、叛徒杨献珍抛出一个“综合经济基础论”，在我国哲学战线上挑起了一次大斗争。这是一场关系到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关系到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的原则性的大斗争。

“综合经济基础论”，实际上就是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是一种唯心的历史观，是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的共同“理论基础”。刘少奇、杨献珍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一贯利用这种反动理论，制造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舆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当前深入批修整风，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的时候，我们必须进一步彻底批判“综合经济基础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揭穿唯生产力论的反革命实质，以肃清其余毒。

“综合经济基础论”是 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时代。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我国的阶级关系和经济状况，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毛主席号召全党要继续革命，依靠并强化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逐步地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在这个革命的转变关头，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挥舞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破烂武器，疯狂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抛出一个所谓“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纲领，直接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相对抗。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到处鼓吹发展资本主义，胡说：“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没有大工业，是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国搞社会主义是二、三十年以后的事”。他们主张长期保存和大力发展富农经济，鼓吹“要巩固农民的私有财产”，攻击农业合作化“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刘少奇还把他们一伙直接控制的马列学院（后改称高级党校），作为大造反革命舆论的黑据点，从一九四八年秋开始，他多次跑到马列学院，大肆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毛主席对刘少奇一伙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阴谋进行了

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讲话中，痛斥了刘少奇一伙“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革命纲领，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是“有害的”，“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但是，这伙叛徒并不死心。正当全党学习和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关键时刻，叛徒杨献珍秉承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旨意，把“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黑纲领改头换面，炮制了鼓吹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利用马列学院的讲坛和学习讨论的一切机会，到处宣扬。他大放厥词，叫嚷要“澄清混乱思想”，疯狂对抗党的总路线。

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发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加快进行。一九五五年，刘少奇及其同伙策划了“反冒进”的罪恶阴谋，提出了“停”、“缩”、“整”的反革命方针，大砍合作社，妄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就在这个时候，杨献珍煞费苦心，把“综合经济基础论”系统化，写成一篇题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的反动文章，为刘少奇一伙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阴谋制造“理论”根据。文章写好后，杨献珍急急忙忙给刘少奇送去领功讨赏，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希望你能抽暇审阅一下，并予以指示。”杨献珍还抬出他的黑主子来，压制不同意见。这完全暴露了“综合经济基础论”是在刘少奇导演下炮制出来

的。值得注意的是，杨献珍自己还供认，他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是跟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商量过的”。这就完全证明，挑起这场斗争，是杨献珍和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共同策划的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阴谋。

在两条路线严重搏斗的紧要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光辉著作，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粉碎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和反革命阴谋，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三大改造”的社会主义高潮，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胜利，反动的“综合经济基础论”遭到了彻底破产。

“综合经济基础论”是 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

“综合经济基础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货色呢？

叛徒杨献珍宣称：“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类型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是“综合的”，“既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也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也包括个体农民经济成分”；它们“能够平衡地互相衔接地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为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也要为资产阶级服务”。这完全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谓“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政权”，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

集中表现，其经济基础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而资本主义经济，对资产阶级是发财致富的天堂，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却是贫穷苦难的深渊。它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是同无产阶级专政根本相反、水火不容的。怎么可以设想无产阶级专政能够建立在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所谓“综合经济基础”之上呢？

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来看，杨献珍的谬论尤其荒唐。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废除私有制。列宁在谈到过渡时期的经济时指出：“只要还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存在。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同这个基础进行胜利斗争的唯一手段，是消灭阶级的唯一办法。”（《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三五五页——三五六页）在我国，正是利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手段来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我们采取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对中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农业、手工业合作化等等一系列措施，来逐步消灭资本主义和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巩固革命的胜利，才谈得上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怎么能把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所谓“综合经济基础”当作自己的经济基础呢？

事实上，所谓“综合经济基础”是根本不存在的，那完全是杨献珍一伙的捏造。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确面临着五种经济成分，归结起来，也就是既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又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但是，社会主义和

资本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制度**，它们不是，也不可能象杨献珍所说的那样和平共处，共同组成一个所谓“综合经济基础”，更不可能“平衡地互相衔接地发展”。列宁说：“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第四卷第八七页）毛主席进一步指出：“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事情正是这样。我国过渡时期的历史表明，两种经济成分之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或者是向社会主义前进，或者是向资本主义倒退。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决没有调和的余地。杨献珍的所谓“综合”，无非是要搞“合二而一”，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斗争，妄图让资本主义吃掉社会主义。所谓“平衡发展”，其实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倒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去。刘少奇一伙从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出发，不是公然宣布要和资本家合伙干它几十年，等“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再搞社会主义吗？这些自命为“天才理论家”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还叫喊：“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在现代中国……却是进步的”，“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却还有它的作用”等等。这就是杨献珍的所谓“综合”、所谓“平衡发展”的老底。请看，在这伙无耻叛徒的心目中，那里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影子呢？！杨献珍鼓吹什么“综合经济基础”云云，拆穿了不过是要把我们的国家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经